

#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 班雅民的裸命、活物與科技技術複製性(II-II) 研究成果報告(完整版)

計畫類別：個別型  
計畫編號：NSC 98-2410-H-004-183-  
執行期間：98年08月01日至99年10月31日  
執行單位：國立政治大學英國語文學系

計畫主持人：邱彥彬

計畫參與人員：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李欣娟

報告附件：國外研究心得報告

處理方式：本計畫可公開查詢

中華民國 100 年 04 月 18 日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期中進度報告

班雅民的裸命、活物與科技技術複製性(II-II)

計畫類別： 個別型計畫  整合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 98-2410-H-004-183-

執行期間：98年8月01日至99年10月31日

執行機構及系所：政治大學英國語文學系

計畫主持人：邱彥彬

共同主持人：

計畫參與人員：李欣娟

成果報告類型(依經費核定清單規定繳交)： 精簡報告  完整報告

本計畫除繳交成果報告外，另須繳交以下出國心得報告：

赴國外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

赴大陸地區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國際合作研究計畫國外研究報告

處理方式：除列管計畫及下列情形者外，得立即公開查詢

涉及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 一年 二年後可公開查詢

中華民國 100 年 4 月 18 日

## (一) 中英文摘要與關鍵字

### 計畫中文摘要

本計畫將重新檢視「活物」、「裸命」與「科技技術複製性」等三個班雅民的重大觀念，這三個相關的觀念不僅是班雅民現代性批判的理論主軸，也具體而微地包藏了他對社會革命的思考。班雅民早從“On Language as Such and on the Language of Man”與 *The Origin of German Tragic Drama* 就開始發展有關「活物」的說法，在當時設定的框架下，活物形態指的是一種墮落後的狀態，在這個狀態下，自然不僅被剝奪了溝通的能力，生命也自此開始頹萎。經過阿岡本在 *Homo Sacer* 與 *The Open* 中的闡釋與挪用，「活物」這個原本晦澀的概念開始變得清晰，同時也開始帶有相當的政治意涵。作為「活物」的延伸概念，「裸命」指的是一種怪異的臨界狀態，在這個狀態中，猶太人的身體因為被剝奪了公民權、被非人化的關係反倒顯得過度像人。

班雅民堅定主張活物狀態的不可逆轉性，這樣的說法看似悲觀，但絕不宿命。本計畫將更進一步研究被複製機器奪除生命、被科技技術複製性完全滲透的科技複製活物，如何反過來模擬機械，進而引發革命的狂笑，形成對生命政治的挑戰。在班雅民的論述中，科技複製活物有許多的化身—包括米老鼠像原生質一般隨時處在變異狀態的身體，與卓別林既斷裂又流暢的身體姿勢與動作都是。科技複製活物所引發的「橫隔膜痙攣」之所以帶有革命性，主要的原因在於大笑可以造成群眾的解離效應—群眾彼此解離，甚至自我也會產生解離（這就是 *Lockerung* 的原義）—將群眾轉化為一群公共的、具有同志情誼又有階級意識的集體活物。透過科技複製活物，班雅民預想了一個遭到阿多諾排除的可能性：那就是，大笑不見得是認同施虐者的病徵，電影院反倒有可能是組織一個沒有領袖情結的集體活物的訓練場，藉以防堵在納粹的魔法棒下群眾的非理性動員。

**關鍵字：**班雅民、阿岡本、裸命、活物、模擬、科技技術複製性、集體活物、生命政治

This project seeks to re-examine “the creaturely,” “bare life,” and “technological reproducibility,” three interrelated ideas that stand to the fore in Walter Benjamin’s critique of bio-political governmentality and contain in crystallized form much of his ruminations on social revolution. Developed in “On Language as Such and on the Language of Man” and *The Origin of German Tragic Drama*, the idea of “the creaturely” signifies the post-lapsarian state in which the nature is deprived of the capacity for communication and thereby rendered devitalized. This otherwise convoluted idea is fleshed out and takes on more definite political contours in Giorgio Agamben’s *Homo Sacer* and *The Open*. “Bare life,” a correlative of “the creaturely,” now marks a vanishing point where the Jew’s body appears all too human insofar as it is deprived of citizen rights and, so to speak, dehumanized.

However pessimistic it may seem, Benjamin’s strident insistence on the irreversibility of the creaturely state breathes no air of fatalism. This project will take a step further to see how the mechanized creature, which is devitalized by the copying apparatus and saturated with technological reproducibility, will join hand in hand with the mimetic body of the creature to evoke fits of revolutionary laughter and blast the bio-political apparatus. In Benjamin’s writings, the mechanized-cum-mimetic creature finds its full embodiment in the plasmatic body of Mickey Mouse, and in the staccato posture of Charlie Chaplin. The “convulsion of the diaphragm” these creatures cause is revolutionary, I will try to argue, to the extent that laughter is very likely to loosen up (*locker*) the masses, alienating them from one another and even from themselves, and turning them into a collective creaturely body (*leibhaft*) organized with solidarity and class-consciousness. By way of the mechanized-cum-mimetic creature, Benjamin thus envisages a possibility ruled out by Adorno: instead of being a symptom of identifying with the aggressor, laughter is rather instrumental in organizing a collective creaturely body without the follow-the-leader mentality, which will then serve as a preemptive antidote to the mass psychosis caused under the baton of Nazism.

**Keywords:** Benjamin, Agamben, bare life, the creaturely, mimesis, technological reproducibility, *leibhaft*, bio-politics

## (二) 報告內容

### 一、 前言

一般探討班雅民機械複製性，藝術的民主化現象是其中的一個探討重點。持此論者，在概念上大多沿襲波特萊爾有關巴黎沙龍的藝評，認為布爾喬亞的一大貢獻在於解除貴族階級對於藝術創作與流通的壟斷，藝廊或沙龍的創立形同一場文化霸權的爭奪戰，意圖從貴族手上奪回文化品味的界定權。此類的說法當然與班雅民在談論機械複製性的文章中的若干論點相當契合，但若深入班雅民有關科技的論述，卻可以發現所謂的機械複製性談的不只是副本的無限複製與流通而已。複製性，無關乎複製科技的本質，而是能力（potenza），而複製指的也不僅僅是副本的繁衍，而是複製機器造就正本的內在分裂的能力。這裡的正本，講的更精確一點，指的是與機器相互較勁、搏鬥的生命個體。一如阿岡本在〈作者作為姿勢〉（"The Author as Gesture"）中所言，傅科將作者化約為功能（author function）的說法太過狹隘，作者在文本中完全缺席的說法，忽視了作者（與讀者）以其「無表現性的姿勢」（inexpressive gesture）（如動手書寫或拾起書本閱讀）佔據作者缺席所留下的空白位置以成就文本意義的事實；換句話說，作者是以其姿勢「見證他在作品中的缺席」。因此，與複製機器面對面遭遇的生命個體（如演員），和正與文字機器搏鬥的作者一樣，同樣是在與機器遭逢的過程中製造出來的分裂主體：假如阿岡本所說，書寫是主體無從控制的「生命守護精靈」（Genius）與主體自我（ego）的擷抗過程，那在複製機器前的演員，在隨時必須「再來一次」的表演過程中，面對的則是必須把機械過程轉譯為身體過程、將流暢的身體運動斷裂為姿勢碎片的內在異化。但這裡講的異化，並非僅僅是人類生命遭致剝奪（expropriation）的結果而已。假如書寫或表演主體的分裂，並不是像傅科所理解的那樣，只是證明了作者淪為功能的完全缺席，那姿勢的概念除了揭露主體異化的存在狀態之外，**同時**也以主體的在場來見證主體的缺席。換句話說，在語言機器的全面統御下，作者依舊以姿勢的形式頑固現身，因而拉出一條生命永遠無法為機器所擁有、據用的抵抗線。因此，複製機器製造的可複製性，一方面生產出生命遭受異化的裸命，但另一方面也不斷孳生出機器無法完全據用的姿勢。在這過程當中，異化的實狀與抵抗的可能同時發生，因此我們可以說裸命既是生命政治的標的與產物，也是抵拒生命治理的起點。這是班雅民的「可複製性」理論的生命政治意涵。班雅民在〈機械可複製性時代的藝術作品〉中，主張「第二科技」開啟了生命可以再次重來的「目前性」（provisional），在複製機器不斷的實驗與測試程序下，「人類首度得以與自然拉開距離」，意圖說明的正是複製機器的「能力」，讓人以裸命的存在樣態，

開啟一個與生命政治治理下的自然生命徹底斷離的新生命。

## 二、研究方法與研究成果概述

本年度的研究計畫則是以裸命的抵抗可能性為研究重點，並試圖闡明此類抵抗的特殊性。對班雅民而言，不管是米老鼠的電影或卓別林怪異的肢體動作，都是裸命的姿勢，當中可見裸命的畸零存在，同時也飽含以姿勢抵抗機器的反叛性。米老鼠與卓別林的例子，說明了在生命政治的治理下，裸命的救贖契機不在於回復畸零生命生命完整性，而是在於將裸命的存在樣態更往前推進一步，將「姿勢」基進化，也就是將機械過程徹底轉譯為生命過程。唯有將裸命的畸零存在二度畸零化，將姿勢轉化為生命存有的直接外顯，而非將之視為生命扭曲的症狀除之而後快，如此中止生命機器運作的時刻才有可能出現。根據班雅民與阿岡本的生命政治理論，倘若以回復生命完整性為救贖計劃的首要目地，結果通常是適得其反，不僅無法中止生命政治機器的運作，反倒會將生命政治機器轉化為殺人機器，讓生命政治成為死亡政治的孿生兄弟。本年度的計劃正是以班雅民的機械複製性與阿岡本的裸命說為主要的理論脈絡與思考起點，將生命政治理論的提出視為一種事件，在事件發生之後，既有為抵抗而建構的理論框架，不管是右派的生命至上論或左派的生命異化論，都面臨了必須徹底拆除重建的迫切性。對事件不忠誠的結果，通常只會在揮舞一切以生命為上的大旗的同時，招來揮之不去的死亡幽靈。以下，容我援引本年度研究計劃研究成果〈反胃的社會主義？：論辛克萊《叢林》的生命政治〉一文的前言，作為研究成果的概述。

有關現代性中政治逐步往生命趨近的現象，鄂蘭（Hannah Arendt）與傅科（Michel Foucault）分別從自己的哲學脈絡提出兩種反思生命政治的典範論述。在1958年出版的《人類景況》（*The Human Condition*）中，鄂蘭以「勞動人」（*homo laborans*）作為現代人的主導隱喻，剖析現代社會如何將人困鎖在生命的自然律當中，導致公共的、得以自由揮灑（spontaneous）又帶有創造性的政治行動（action）被阻絕在社會與生物生命的牢籠之外。作為現代性的一項表徵，政治與生命之間在關係上的質變同樣是傅科在70年代中葉以後持續關注的焦點。在《人類景況》的出版約莫二十年後，《性史一》（*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An Introduction*）問世。傅科開宗明義，強調當西方社會跨越「現代性的門檻」，人具備讓自己成為「政治存在的額外能力」的說法隨即失效，再也無法替現代人的存在處境提供一個合乎現況的精確定義。在這個後亞里斯多德的年代，人非但無法藉諸政治行動來證明自己具有超越生命存有的優越性，政治反倒讓人「作為生命存有的存在」陷入重重的「疑問」當中（1980:

14)。為了釐清政治／權力與生命之間的糾葛，切實描述政治與生命在直接對撞中雙邊產生的複雜變異，傅科分別在《性史一》以及1975、76年間的法蘭西學院講座《〈社會必須被捍衛〉》（“*Society Must Be Defended*”）裡，嘗試性提出「生命權力」（bio-power）的概念，首度將18世紀中葉之後出現的兩種權力行使方式——規訓權力與生命權力——做一層次上的區分：雖然兩者互不排斥，但屬於「非規訓性」的生命權力，著力的對象已經不是規訓權力所要正常化的個別身體或「做為身體的人」（man-as-body），而是「作為活生生有有的人」（man-as-living-being），或是集體的、具備統計學意義的「作為物種的人」（man-as-species）（2003: 242, 246-47）。

雖然鄂蘭以希臘的城邦政治作為其政治概念的原點，而傅科背後則有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的系譜學為其理論後盾，但不可否認，除卻迥異的哲學脈絡，他們切入當代生命政治的角度極為類似，同樣著眼於當生命與政治這兩個原本互不相涉的領域開始交互滲透，也就是當生命開始政治化，政治開始生命化之後，各自所產生的化學變異。比較費疑猜的是，鄂蘭與傅科所代表的兩大典範論述之間，雖然具備共同的問題意識，但卻絲毫不見任何直接傳承或對話的關係。阿岡本（Giorgio Agamben）在《聖人》（*Homo Sacer*）的序章，就直接指出傅科自顧自地開展他的生命政治研究，完全沒有引述作為先行者的鄂蘭（1998: 4）。見微知著，阿岡本認為傅科拋棄繼承的作法，「見證」了思索現代的生命政治勢必遭逢的「困難與阻力」（1998: 4）。但究竟有哪些「困難與阻力」叫傅科不得不無視於鄂蘭這位理論的先行者，阿岡本並未明說，反倒進一步推斷這些困難之處「極有可能」是讓鄂蘭與傅科在生命政治論述的領域裡步履維艱的主因：這些「困難與阻力」，一方面讓鄂蘭未能將《人類景況》中發展出來生命政治觀點，與她先前對「集權權力」的研究作一有效的整合與接軌，另一方面也讓傅科自始至終都未能仔細處理「集中營」這個代表「現代生命政治的示範場域」的問題（1998: 4），為他終其一生依舊不見完備的生命政治論述加添一筆缺憾。暫且不論阿岡本對鄂蘭與傅科的評點是否公允，我們倒是可以就此推測以鄂蘭與傅科為馬首是瞻的生命政治研究，究竟是遭逢了什麼樣的「困難與阻力」。50年代的鄂蘭尚未能將生命政治的觀點帶入極權政治的研究，但時隔二十年，傅科依舊無法妥善處理鄂蘭遺留下來的理論盲點，一樣只在生命政治與自由主義／新由主義的關係中打轉，未能將觸角伸入集中營這處「現代生命政治的示範場域」。換句話說，傅科唯一繼承自鄂蘭的，就是把代表死亡政治的集中營劃為生命政治研究的禁地，而這歷經二十年遲遲未能矯正過來的理論偏盲，也說明了生命政治與死亡政治之間始終未能建立的理論連結，或許正是生命政治研究的「困難與阻力」所在。

藉由各打鄂蘭與傅科五十大板，阿岡本清楚點出「集中營」是當代生命政治研究必須側重的方向。

但過份強調鄂蘭與傅科共同的理論盲點，結果卻有可能淡化兩人在生命政治論述上的重大歧異，更何況這樣的歧異，指向的正是阿岡本念茲在茲的「集中營」問題，也就是生命政治與死亡政治直接媒合的現代政治常態（Agamben 2002: 83）。事實上，鄂蘭與傅科之間欠缺的也許不是理論思考的援引與延續，而傅科拋棄對鄂蘭思想遺產的繼承，暗示的或許也不僅僅是當代生命政治研究的「困難與阻力」，而是彼此之間對話基礎的根本匱缺。本文認為，傅科之所以無法繼承鄂蘭，不是應能而未能，而是根本不可能，主要的原因在於鄂蘭所論述的生命過程與生死迴圈說，明白指向傅科因受限於某種「困難與阻力」，無能在其生命政治論述中釐清的生死辯證問題。

根據鄂蘭的說法，所謂的自由主義的生命政治治理，指的是在社會以民族國家為其政治形式成形之後，原本必須被框限在家庭私領域的生命經營，自此堂而皇之進入社會這個既公且私（或是不公不私）的領域，此乃生命政治的肇始。在生命社會化、私生命公共化的同時，也很弔詭地加速了政治往管理（administration）等去政治化的方向進行質變，人們開始習慣以本屬私領域的「家庭」的形象來看待「人民與政治社群」，認為他們「日常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一切」，理所當然都要由「一個巨大的、全國的家計管理」機器來打理、照料（Arendt 1958: 28-45）。「允許勞動動物（*animal laborans*）佔據公共領域」的結果（Arendt 1958: 134），迫使古典政治全面退卻，治大國淪為烹小鮮，弔詭地讓生命政治誕生在生命與政治的裂縫當中。生命與政治的分裂，讓古典政治無法在社會中找到施力的空間，而在社會領域中出現的政治真空，也讓生物生命中自然命定的不朽律則，趁隙一躍成為公共的規範準則（Braun 18），導致政治與歷史的自然化和去政治化。<sup>1</sup> 針對這項論點，鄂蘭重解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提出的勞動理論，批判馬克思不僅在理論上將勞動圍困在消耗（生產）—回補（勞動力的再生產）、死—生的無窮迴圈，也暗示勞動注定被圍困在自然化的歷史內，讓自然本身具備的必然性在公共領域中取得絕對的支配高度（Arendt 1958: 96-109）。至此，社會與自由成為不可能產生交集的矛盾概念，而生命政治之所以潛藏逆轉為死亡政治的可能性，變成裸命的生產機器，主要的原因在於生命政治中的政治乃是偽裝成政治的家計管理。在生命政治的政權下，政治創造為生命過程（life process）必然的生死迴圈所取代，生命自然律成為社會治理的內在（immanent）規範，自然化／生命化的政治與歷史不僅將生命存在僵化為裸命，自然歷史的迴圈也會將任何試圖在社會的層次上反抗生命政治、抵拒生物必然性的勞工運動，再次吸納到具備內在性的生命治理當中，順著同樣不見出路的

<sup>1</sup> 有關社會的形成一面讓生物生命的福祉成為具備普遍性的公共準則，一面讓在去政治化的進程中加速政治力萎縮的論點，麥可·哈德（Michael Hardt）與安東尼歐·尼格里（Antonio Negri）曾作過一個扼要的描述：在市民社會的領域上，「現代的國家主權往內在性流變（下降至資本主義社會），在此同時，資本主義社會也以相反方向往超越性流變（上升至國家）」。見 *Empire*，頁 328。



生死輪迴打轉而無從超脫（Arendt 1958: 133）。<sup>2</sup> 若勞工運動注定失敗，鄂蘭認為那是因為任何以勞動者的生命福祉為訴求的抵抗行動（譬如說降低工時，透過機械化提高生產力，增加勞動者可自由支配的時間），除了讓勞動者不斷蒙受死亡政治的威脅之外，根本無法讓作為歷史主體的勞動者真正佔據一個超越自然歷史的政治位置，打開生命過程的閉鎖迴路。

鄂蘭認為，生命過程成為自然鐵律，讓政治與生命同時臣服在自然歷史的支配之下，這無非是生命政治將生命提升至偽公眾的社會層次，同時把政治行動矮化為去政治化的家計管理的結果。一旦家計管理式的政治治理與躍升為公共法則的私生命，一同在社會的平面上無縫接合，這不僅無助於生命品質的保障，反倒會讓原本以維存生命為己任的家計管理，搖身一變成為加速生命存在裸命化的內在動力，讓生命墮入以生命維存法則為基礎而建置之生死迴圈之中。政治生命化加上生命政治化，最終導致生命政治朝向死亡政治逆轉，構成了自由主義生命政治政權不時暴露的基本症狀。阿岡本也是依循著類似的論述脈絡，重新定位二十世紀兩大極權政權的歷史成因。根據阿岡本的說法，不管是納粹抑或蘇聯的極權統治，承繼「民族主義與帝國主義」這些十九世紀的未竟之業，並不是兩者自詡肩負的使命（Agamben 2004: 76）。事實恰恰相反。巨幅的民族主義論述與帝國拓展的擴張大計非但不是極權主義的基礎，政治使命（task）的日益貧乏萎縮才是極權主義源起的主因。阿岡本認為，一如政治的撤離讓生物過程得以以偽公共規範之姿現身，極權主義唯一能動員來填補空缺的元素，只剩下「人民的事實存在」（the very factual existence of peoples），也就是「他們的裸命」，如此政治使命的匱缺，無疑展現出「黑格爾—科傑夫式（Hegelo-Kojevian）的歷史終結觀的另一面」：對已經到達歷史終點因而還原為動物的人類而言，「唯一僅存的，只有……一肩挑起生物生命本身作為其至高無上的政治（抑或非政治）使命，藉此達成人類社會的去政治化」（Agamben 2004: 76）。

與鄂蘭不同，傅科的生命政治論述不時反過來，無視於政治的生命化，反將生命政治下的政治操作當做是與生命敵對的力量，或是視之為把生命政治逆轉為死亡政治的外部干擾源，這樣的想法明顯與傅科自己提出的「生命權力」概念背道而馳。政治忽而生命化、忽而是生命的外部威脅，這種論述的飄忽不定，不僅是傅科生命政治論述的不時陷入的困境，也是他不可能繼承鄂蘭的思想遺產的原因所在。傅科當然清楚以維存生命為宗旨的自由主義，不需外部因素介入干預，光是政治的生命權力化，就足以讓自由主義的生命政治內含轉化為死亡政治的潛能。在《生命政治的誕生》（*The Birth of*

<sup>2</sup> 由此可見阿岡本對鄂蘭的批評相當具有洞見。雖然阿岡本在《聖人》的序章並沒有清楚交代他對鄂蘭的評價，但就行文脈絡觀之，我們可以瞭解阿岡本並不否認《人類景況》對生命政治與死亡政治辯證逆轉有一定的認識與論述。鄂蘭的問題在於未能將《極權主義的緣起》（*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中的「深度分析」帶入《人類景況》，用後者提出的「生命政治角度」來探討集中營的問題。見 Agamben, *Homo Sacer*, 頁 4。

*Biopolitics*) 的講座中，傅科明白指出自由主義的內在弔詭：訴諸政治力的自我限縮來確保個人的利益與自由不受危害，這一向是自由主義標榜的保護原則，但在保障自由的普遍性 (universalism) 之外，為了預防「利益機制」 (mechanism of interests) 危及個人與群體「安全」 (security)，自由主義也必須同時把自己打造成一個創生自由 (liberogenic) 的機制，不時以「危險」 (danger) 為名，在自由與安全、維護利益與剝奪自由之間，透過政治與法律的力量做一決斷。換句話說，在自由主義的機制底下，強調個人利益的「經濟自由」與「監管」個人行為「規訓技術」——也就是確保自由的生命政治與認定、排除誰不得享有自由的死亡政治——不僅在歷史上「同時出現」，在邏輯上也是屬於相互證成的關係。更有甚者，有時根據看似自由主義對立面的「創生自由」機制而施行的種種控制 (control) 作為，甚至可能變成確保自由不受侵害的「首因」 (Foucault 2008: 65-69)。

但本來是自由主義內部一個銅板兩個面的辯證逆轉 (Foucault 2008: 66)，傅科卻話鋒一轉，突然將之定調為外部干擾的影響所致。確保自由與創生自由的共生，這原本是自由主義內部因為「自由與安全的相互牽引」 (Foucault 2008: 65) 而配置的弔詭機制，但傅科卻是用「自由主義的危機」，或自由主義「治理性總體配置的危機」等末日學字眼來為自由主義的內在翻轉作出總結 (2008: 69-70)。是自由主義遭逢危機，而非自由主義本身即是一項危機——如此的措辭顯然暗示自由主義的危機來自外部，而非內在的辯證逆轉。<sup>3</sup> 傅科的說法之所以可議，論述的搖擺不定只其中一個問題。更值得注意的是，當傅科將自由主義的內在矛盾轉化為外在危機的同時，無形間也確保了自由主義作為生命政治的純粹性，不僅讓他的論述無法像鄂蘭一樣，一以貫之從生命過程的自然律則切入，確實掌握生命政治生死的內在辯證，連帶也讓傅科無法精確定位生命政治的真正外部所在，錯把生命政治機制內在二律背反的一端錯誤當成是外在的干擾源，以致於在論述上失去想像真正的外部的能力。<sup>4</sup> 傅

<sup>3</sup> 誠如審查人之一所言，傅科在此所謂的危機「不等同於」本文指稱的「外部干擾」，「也可以是」本文「所謂的『辯證逆轉』」。自由主義因為「自由與安全的相互牽引」而造成的內部危機，本來就是傅科在《生命政治的誕生》第三講的基調之一。「治理的自由技藝最終自行帶出……治理性的危機」一說，證明問題不在傅科對自由主義內部的辯證逆轉視而不見，而危機的確是禍起蕭牆，不需牽拖任何來自外部的政治與經濟干擾。見 *The Birth of Biopolitics*，頁 68。但「自由主義的危機」一詞，卻又讓人不免認為傅科心中的自由主義是一個沒有內在張力拉扯的完形整體。從自由與安全相互牽引、拉扯的說法，合理的推論應該是導向「自由主義本身即是危機」 (liberalism as crisis) 的結論，強調例外狀態的常態化，而非「自由主義的危機」此類依舊將例外狀態視為暫時或偶發的突變現象的說法。在此，本文並非在傅科的用字遣詞上大做文章。早在前一年的法蘭西學院講座《安全、領土、人口》 (*Security, Territory, Population, 1977-1978*) 第二講中，傅科就已經一反他在《規訓與懲罰》 (*Discipline and Punish*) 中的主張，坦承當時他把 18 世紀「自由主義意識型態與自由主義政治」的建置跟規範自由的「規訓技術」視為一體兩面的說法，雖然不見得全錯，但顯然誤置了問題的重點。見 *Security, Territory, Population*，頁 48。(在《規訓與懲罰》裡，傅科認為「『啟蒙』發現了自由，也發明了規訓」，而「規訓機制」的權力運作，最終成為強調形式平等與自由的「司法框架」下的「幽暗面」。見 *Discipline and Punish*，頁 222。) 換句話說，傅科在《安全、領土、人口》裡，試圖揚棄自由與規訓的內在辯證，轉向從非規訓的角度，重新描述自由主義以「自然」為依歸的權力操作技術，顯然是把自然化、生命化的政治與規訓權力作一切割，快刀斬斷自由主義內部的糾纏牽扯。本文大膽推測傅科在《生命政治的誕生》中，認為自由主義有危機，而非自由主義本身就是危機的說法，大抵源自於他在前一年的講座中對於自由與規訓的切割。

<sup>4</sup> 對生命政治中生死辯證互生閃閃躲躲，極力維護自由主義獨尊生命的純粹性，這一直是阿岡本批評傅科的基調。阿岡本認為，雖然傅科承認在「賜死讓生」 (to make die and to let live) 的古典王權，與「賜生讓死」 (to make live and let die) 的生命權力之間，不時出現交疊的含混現象，但盡可能維持兩者「在本質上互不相容」 (essentially heterogeneous) 與「在概念上涇渭分明」 (conceptually distinct)，才是傅科系譜學的首要之務。但一旦面對既「賜生」又「賜死」的納粹政權，「生命政治與死亡政治在無辯證中介的情況下同生接合」 (biopolitics coincides immediately with thanatopolitics) 時，不難想見如此僵化的區辨會讓傅科陷入何等左支右絀的分析情境。見 Agamben, *Remnants of Auschwitz*，頁 82-83，原標重點。系譜學強調的斷裂與不連續性，不僅在概念上與本質上維護了自由主義的純粹性，把過時的古典王權染指生命權力的事實當作歷史的非常態性例外。在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藉此推測為何傅科會把政治介入視為來自生命政治的外部干預：根據系譜學的斷裂說，一旦生命政治為死亡陰

科有關確保自由與創生自由的討論，主要是以小羅斯福的新政為例，認定政治對經濟的總體規劃與干預是讓自由主義陷入危機的外部因素，造成18世紀中葉以來西方自由主義的首度空窗期。但新政的政治調控果真是自由主義生命政治的外部干擾源？還是內部的防火牆或自體免疫機制？新政究竟是自由主義經濟政體的偶發例外？還是這個例外早就是自由主義的常態？相較於鄂蘭，傅科到頭來不管是對生命政治內部辯證的掌握，或是對系統外部的超越想像，在論述上都無法真正到位。將生命政治的內部辯證歸咎於外部因素，傅科不僅無法處理自由主義生命政治內在的生死辯證，同時也因為缺乏對系統外部的確實思索，而頓失脫離內部辯證的方向感。

艾思普齊拖 (Roberto Esposito) 認為，面對全新的生命政治型態，論述語彙必須從傳統的政治概念——諸如左派與右派、集權主義與民主的二元對立——轉向「自然歷史化」(也就是生命政治化、或生命存在的裸命化)與「歷史自然化」(也就是政治的生命化與家計管理化)此一更為「深層」的「衝突對立項」(2008a: 640)。換句話說，唯有更確實地掌握生命政治內部尊重生命與製造死亡的共生現象，以及生死辯證可能引發的衝突與對立，方能精確定位超越生命政治的外部究竟何在。針對生命政治的相關問題，本文認為鄂蘭顯然提出一個比傅科更為精確的分析論述。以下，本文將以辛克萊 (Upton Sinclair) 的《叢林》 (*The Jungle*) 在老羅斯福主政的進步時期 (Progressive Era) 所引發的風風雨雨為例，以鄂蘭與傅科對話的不可能為理論基礎，分別從小說的內外緣切入，重新檢視政治生命化與生命政治化的生死辯證。本文認為，不管是老羅斯福以政治介入社會進行的生命調控，還是辛克萊鼓吹的社會主義運動，都不能視為是外於社會、外於生命、由上而下的政治手段，因為兩者均屬在社會生命的內在性平面上進行的家計管理。因此，《叢林》出版所引發的爭議以及辛克萊與老羅斯福之間的齟齬，只不過是纏繞在生命政治周遭的煙幕而已。辛克萊「瞄準心卻打中胃」的感嘆，表面上把生命與政治一刀切開，認為老羅斯福關心的不過是大眾生命的維存，但小說家真正在意的是更高層次的解放政治，但事實上辛克萊將富萊契主義 (Fletcherism) 的健康飲食觀與尼采共一爐而冶之的社會主義，非但無法超脫老羅斯福的生命政治操作，兩者反倒是殊途同歸，全都坐實鄂蘭所批評的政治淪為家計管理的現象，一起在生命政治與死亡政治共同鋪成的道路上攜手前進。不管是老羅斯福「溫和的基進主義」或是辛克萊的社會主義，在生命政治的大旗下，傳統政治光譜的配置已經失去效力，左派右派一起在生命的內在性平面上，進入生命政治的生死辯證，絲毫不見任何超越的可能。富萊契主義與尼采結合，召喚出來的不是解放後的新人類圖像，而是死亡政治的幽靈。既然生命維存法則 (life preservation) 終將導向生命機器與死亡機器的協同運作，以尊重生命為名的人道主義本是問題的癥

---

影所籠罩，顯然是過時的古典王權回返作祟所致，無關乎暗藏於生命政治襯裡的幽冥地域。

結，自然不可能是應對、甚至解決生命政治之道。這正是辛克萊的人道主義可議之處：對勞動者墮入畜生道的慘狀施予憐憫，不但在表述的層次上鈍化小說家對泰勒主義（Taylorism）的批判，更是和生命政治組成一條統一戰線，讓小說再現成為生產裸命，將生命不斷政治化的文字機器。由此觀之，巴迪烏（Alain Badiou）將生命維存原則視為倫理踐作必須超越的障礙，實則與鄂蘭洞悉生命政治中的生死辯證、謀求超越生命政治內在性的思想進路不謀而合。

##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是否適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主要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達成目標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以 100 字為限）

實驗失敗

因故實驗中斷

其他原因

說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

論文： 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利： 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 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 100 字為限）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 500 字為限）

裸命以其存在樣態作為抵抗的起點，其特殊性有助於幫助我們理解生命政治理論的提出其實是一個事件，瓦解了既有理論的基本假設，而不僅僅是眾聲喧嘩的理論地景中一個新浮現的理論景點而已。彰顯生命政治理論的後設意義，是本年度計劃的重要成果之一。

##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項下赴國外(或大陸地區)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

日期：100年4月18日

計畫編號	NSC 98-2410-H-004-183-		
計畫名稱	班雅民的裸命、活物與科技技術複製性(II-II)		
出國人員姓名	邱彥彬	服務機構及職稱	政治大學英國語文學系
出國時間	99年7月11日至 99年7月22日	出國地點	維也納、柏林

### 一、 國外(大陸)研究過程

維也納：在維也納停留期間，造訪 Wiener Jugendstil 的幾個主要地標是主要的行程。其中以 Otto Wagner 設計建造的 Postsparkasse 與 Majolica-Hauses 為行程重點。另一個參訪的地點則是位在鄰近 Majolica-Hauses 的 Secession，與移地研究的當時正在展出 Klimt 與 Schiele 的作品，以 Vienna 1900 為主題的 Leopold Museum  
柏林：Jüdisches Museum 的參訪是行程的重點。

### 二、 研究成果

班雅民在 *The Arcades Project* 中曾說，在西方的藝術史中，以藝術的呈現來直接單挑科技技術的例子屈指可數，唯有寫實主義與 Jugendstil 而已 (S8a, 1)。班雅民接著以應對科技時採取的不同路徑，來區分寫實主義與新藝術運動的差異：假如寫實主義對「科技複製的新過程」感到「不安」，這個問題在新藝術這一邊則是完全遭到「壓抑」，新藝術「不再因為科技的競爭而倍感威脅，隱藏在新藝術之中與科技的對峙因此更具侵略性。新藝術藉助於科技的母題來自於用裝飾來閹割科技的努力」。「壓抑」一字是關鍵，代表寫實主義與新藝術運動的差別，並非建立在對科技的否定排斥與肯定接納的二元對立之上。寫實主義對科技的百般疑慮只是被「壓抑」，而壓抑的結果只是造成新藝術以極具攻擊性的方式來接納科技。新藝術的裝飾傾向便是藝術用來「閹割」科技的武器。班雅民在探討新藝術的裝飾時，不斷出現「冷感」(S9a, 2) 與「不孕」(S8a, 2) 的意象，意在強調新藝術對科技「能力」(potenza) 的閹割，以含納「科技母題」的裝飾造成科技的失能。因此，在新藝術的裝飾風中慣常出現的「自然常數」(“Paris, Capital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20)，便是透過將科技的建築形式從它的「功能關係」中解離出來，化為自然造型的裝飾風格（譬如把鐵條彎曲成植物的造型）的結果，不僅是科技失能的譬喻，也是藝術失能的症狀。在近距離仔細研究 Postsparkasse 的外牆裝飾之後，我終於完全領會新藝術如何以吸納「科技母題」的方式來解除科技的武裝，連帶也讓藝術進展的動力耗竭殆盡，而所謂新藝術的「新」，如裝

飾中的「自然常數」所示，不過是「同一」的不斷回返。換句話說，新藝術是現代性失能、歷史因自然化而僵化的症狀。Postsparkasse 是以混凝土雕塑成方塊造型，中間鑲以鐵材鑄成的小圓點來作外牆的裝飾。班雅民筆下充滿科技能力的建材，經過 Otto Wagner 的設計理念的吸納與藝術處理，功能性盡失，裝飾造型掩蓋功能的結果，抹煞了建材本身在功能上本來就具備的真正「新」的藝術性，讓新藝術的口號成為一種自我欺瞞。在裝飾造型的掩蓋下，混凝土不再讓建築的「裸命」完全暴露在外，而鐵也不再是可以以小搏大、透過功能就可以展現低限藝術潛勢的建材。用阿岡本的話來說，Postsparkasse 的裝飾風，讓建築體像是披著神聖恩典（grace）的赤裸身體，混凝土與鐵材的運用雖然讓建築物看起來有如低限主義一般的赤裸，但「自然常數」的裝飾卻讓它不需感到羞恥。換句話說，導致科技失能、暴露現代性症狀、讓歷史的進展失去動力的新藝術，其實也被生命政治賦予多重身分，因而忘卻自我只是以裸命樣態存在的個體的一個隱喻。因此，要讓歷史重新找回動能，如何讓裸命再赤裸一次才是真正的關鍵。這是 Postsparkasse 的生命政治意涵。

#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項下赴國外(或大陸地區)出差或

## 研習心得報告

日

期：100年4月18日

計畫編號	NSC 98-2410-H-004-183-		
計畫名稱	班雅民的裸命、活物與科技技術複製性 (II-II)		
出國人員姓名	邱彥彬	服務機構及職稱	政治大學英國語文學系
出國時間	99年7月11日至 99年7月22日	出國地點	維也納、柏林

### 一、 國外(大陸)研究過程

維也納：在維也納停留期間，造訪 Wiener Jugendstil 的幾個主要地標是主要的行程。其中以 Otto Wagner 設計建造的 Postsparkasse 與 Majolica-Hauses 為行程重點。另一個參訪的地點則是位在鄰近 Majolica-Hauses 的 Secession，與移地研究的當時正在展出 Klimt 與 Schiele 的作品，以 Vienna 1900 為主題的 Leopold Museum

柏林：Jüdisches Museum 的參訪是行程的重點。

### 二、研究成果

班雅民在 *The Arcades Project* 中曾說，在西方的藝術史中，以藝術的呈現來直接單挑科技技術的例子屈指可數，唯有寫實主義與 Jugendstil 而已 (S8a, 1)。班雅民接著以應對科技時採取的不同路徑，來區分寫實主義與新藝術運動的差異：假如寫實主義對「科技複製的新過程」感到「不安」，



這個問題在新藝術這一邊則是完全遭到「壓抑」，新藝術「不再因為科技的競爭而倍感威脅，隱藏在新藝術之中與科技的對峙因此更具侵略性。新藝術藉助於科技的母題來自於用裝飾來閹割科技的努力」。「壓抑」一字是關鍵，代表寫實主義與新藝術運動的差別，並非建立在對科技的否定排斥與肯定接納的二元對立之上。寫實主義對科技的百般疑慮只是被「壓抑」，而壓抑的結果只是造成新藝術以極具攻擊性的方式來接納科技。新藝術的裝飾傾向便是藝術用來「閹割」科技的武器。班雅民在探討新藝術的裝飾時，不斷出現「冷感」(S9a, 2)與「不孕」(S8a, 2)的意象，意在強調新藝術對科技「能力」(potenza)的閹割，以含納「科技母題」的裝飾造成科技的失能。因此，在新藝術的裝飾風中慣常出現的「自然常數」(“Paris, Capital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20)，便是透過將科技的建築形式從它的「功能關係」中解離出來，化為自然造型的裝飾風格（譬如把鐵條彎曲成植物的造型）的結果，不僅是科技失能的譬喻，也是藝術失能的症狀。在近距離仔細研究 Postsparkasse 的外牆裝飾之後，我終於完全領會新藝術如何以吸納「科技母題」的方式來解除科技的武裝，連帶也讓藝術進展的動力耗竭殆盡，而所謂新藝術的「新」，如裝飾中的「自然常數」所示，不過是「同一」的不斷回返。換句話說，新藝術是現代性失能、歷史因自然化而僵化的症狀。Postsparkasse 是以混凝土雕塑成方塊造型，中間鑲以鐵材鑄成的小圓點來作外牆的裝飾。班雅民筆下充滿科技能力的建材，經過 Otto Wagner 的設計理念的吸納與藝術處理，功能性盡失，裝飾造型掩蓋功能的結果，抹煞了建材本身在功能上本來就具備的真正「新」的藝術性，讓新藝術的口號成為一種自我欺瞞。在裝飾造型的掩蓋下，混凝土不再讓建築的「裸命」完全暴露在外，而鐵也不再是可以以小搏大、透過功能就可以展現低限藝術潛勢的建材。用阿岡本的話來說，Postsparkasse 的裝飾風，讓建築體像是披著神聖恩典 (grace) 的赤裸身體，混凝土與鐵材的運用雖然讓建築物看起來有如低限主義一般的赤裸，但「自然常數」的裝飾卻讓它不需感到羞恥。換句話說，導致科技失能、暴露現代性症狀、讓歷史的進展失去動力的新藝術，其實也被生命政治賦予多重身分，因而忘卻自我只是以裸命樣態存在的個體的一個隱喻。因此，要讓歷史重新找回動能，如何讓裸命再赤裸一次才是真正的關鍵。這是 Postsparkasse 的生命政治意涵。

# 國科會補助計畫衍生研發成果推廣資料表

日期:2011/04/18

國科會補助計畫	計畫名稱: 班雅民的裸命、活物與科技技術複製性(II-II)
	計畫主持人: 邱彥彬
	計畫編號: 98-2410-H-004-183- 學門領域: 文學與文化理論
無研發成果推廣資料	

98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研究成果彙整表

計畫主持人：邱彥彬		計畫編號：98-2410-H-004-183-					
計畫名稱：班雅民的裸命、活物與科技技術複製性(II-II)							
成果項目		量化			單位	備註（質化說明：如數個計畫共同成果、成果列為該期刊之封面故事...等）	
		實際已達成數（被接受或已發表）	預期總達成數(含實際已達成數)	本計畫實際貢獻百分比			
國內	論文著作	期刊論文	1	0	100%	篇	
		研究報告/技術報告	0	0	100%		
		研討會論文	0	0	100%		
		專書	0	0	100%		
	專利	申請中件數	0	0	100%	件	
		已獲得件數	0	0	100%		
	技術移轉	件數	0	0	100%	件	
		權利金	0	0	100%	千元	
	參與計畫人力 (本國籍)	碩士生	0	0	100%	人次	
		博士生	0	0	100%		
		博士後研究員	0	0	100%		
		專任助理	0	0	100%		
國外	論文著作	期刊論文	0	0	100%	篇	
		研究報告/技術報告	0	0	100%		
		研討會論文	1	0	100%		
		專書	0	0	100%		章/本
	專利	申請中件數	0	0	100%	件	
		已獲得件數	0	0	100%		
	技術移轉	件數	0	0	100%	件	
		權利金	0	0	100%	千元	
	參與計畫人力 (外國籍)	碩士生	1	0	100%	人次	
		博士生	0	0	100%		
		博士後研究員	0	0	100%		
		專任助理	0	0	100%		

<p>其他成果 (無法以量化表達之成果如辦理學術活動、獲得獎項、重要國際合作、研究成果國際影響力及其他協助產業技術發展之具體效益事項等，請以文字敘述填列。)</p>	<p>無</p>
--	----------

	成果項目	量化	名稱或內容性質簡述
科 教 處 計 畫 加 填 項 目	測驗工具(含質性與量性)	0	
	課程/模組	0	
	電腦及網路系統或工具	0	
	教材	0	
	舉辦之活動/競賽	0	
	研討會/工作坊	0	
	電子報、網站	0	
	計畫成果推廣之參與(閱聽)人數	0	



#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是否適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主要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達成目標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以 100 字為限）

實驗失敗

因故實驗中斷

其他原因

說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

論文： 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利： 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 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 100 字為限）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 500 字為限）

裸命以其存在樣態作為抵抗的起點，其特殊性有助於幫助我們理解生命政治理論的提出其實是一個事件，瓦解了既有理論的基本假設，而不僅僅是眾聲喧嘩的理論地景中一個新浮現的理論景點而已。彰顯生命政治理論的後設意義，是本年度計劃的重要成果之一。